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4.02.04

## 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外部输血性 引导与扩大农村消费<sup>\*</sup>

王小华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摘要:**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表示外部输血性引导,基于 1997—2011 年我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变迁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的各项收入对其消费支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但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其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相反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其消费的贡献却在逐渐降低;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也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明显小于各项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应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的配置方向,积极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扩张,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和农村信贷中的生产性信贷投入。

**关键词:**农民收入结构;农村消费;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农业信贷投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

中图分类号:F014.5;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2-0034-09

### 一、引言

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而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费乏力、投资过热、外需不足和经济结构失调。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内生增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一过程又必然需要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但是事实情况却是,30 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高速、持续的增长势头,而中国

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却不断走低,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低下。“十二五”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继续加快推进农民增收、优化农民收入结构、扩大财政金融支农力度、打开农村消费市场、保持农村消费扩张是拉动内需、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扩大内需的关键还是扩

\* 收稿日期:2013-10-30;修回日期:2013-12-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047)“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要素集聚与战略协同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3AJY019)“财政金融服务创新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机制与模式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JY062)“农村扶贫金融制度构建与创新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90149)“金融要素空间集聚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化的耦合机理研究”;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投融资体制创新与政策优化研究”

**作者简介:**王小华(1986—),男,重庆云阳人;博士研究生,在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习,主要从事农村金融与财政、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口从 82.08%(1978 年)下降至 47.43%(2012 年),但农村消费总量却不足全国的 1/3。从城乡居民消费对比情况来看(见图 1),城镇居民消费占比一直不断上升,而农村居民消费占比却从 62.1%(1978 年)大幅下降至 22.2%(2012 年)。单就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而言,近年来农村消费进一步出现萎缩现象,1978—2012 年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长率为 11.75%,而 1997—2012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仅有 8.78%<sup>①</sup>。不可否认,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分配不公是直接因素,农民增收渠道及收入来源单一化是主要困境,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引导偏颇是关键环节所在。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改革开放前是相对稳定的,改革开放之后城乡收入比从 2.57(1978 年)扩大到了 3.10(2012 年)。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见图 2),家庭经营性收入和

工资性收入一直是农民收入的主体部分,且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持续下降而工资性收入比重不断上升;近年来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自 2008 年起两者比重之和开始突破总收入的 10%。从财政金融支农来看,1997—2011 年人均财政支农年均增长率为 22.23%,人均农业贷款年均增长率为 23.09%,但这些支农支出大多以补贴的形式进入农民手中,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大打折扣。由此看来,在当前乃至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要提升我国消费空间,必须把握好扩大内需的关键,努力实现农村消费增长。这就需要从收入着手刺激最为广阔的农村消费市场,并通过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引导广大农民成为合理的消费市场群体。因此,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变迁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引导对农村消费的影响,不仅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关注的重点,也是当前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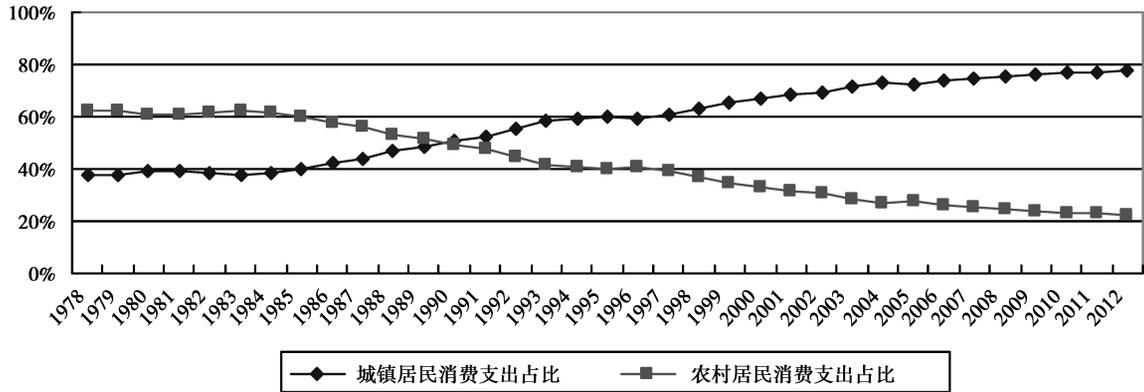


图 1 1978—2012 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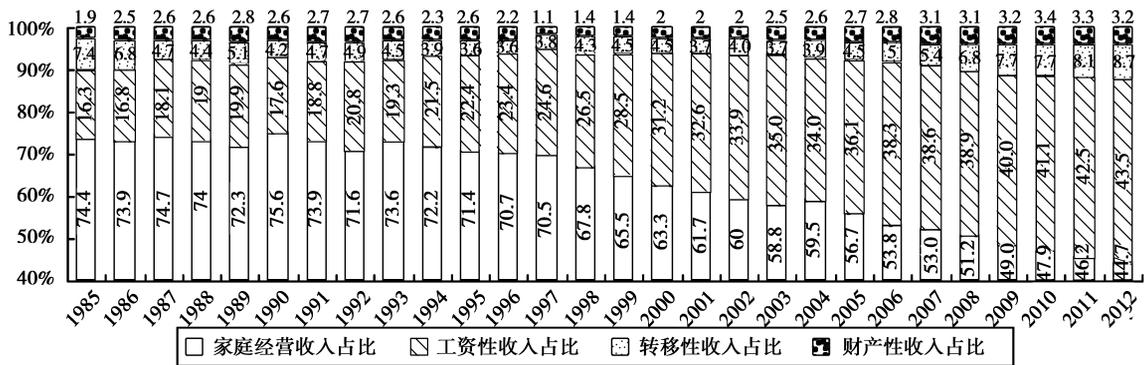


图 2 1985—2012 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化趋势/%

① 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3)计算所得。

西方经济学家对收入与消费及其结构的关系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Edward首次提出家庭消费结构支出分类法。现代消费理论则起源于凯恩斯(Keynes,1936)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Duesenberry,1949)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和布努伯格(Modigliani & 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7)的永久收入假说。之后Hall(1978)考虑到不确定性的存在,将理性预期理论引入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提出随机游走假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预防性储蓄理论(Leland,1968)获得极大发展,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在吸收了理想预期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假说进行了重要拓展,发展起了流动性约束假说(Zeldes,1989)、预防性储蓄假说(Caballearo,1990)以及各种预防性储蓄模型(Zeldes,1989;Deaton,1991;Carroll,1992;Guiso et al,1992;Dynan,1993;Wilson,1998;Carroll,2006),使理论对实际消费数据的解释能力不断加强。

借鉴国外经典的收入—消费理论,近年来国内学者针对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的研究明显增多。李锐和项海容(2004)指出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水平,但暂时性收入对消费支出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蔡跃洲(2009)在对我国农民收入构成进行分解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农民消费的各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指出当前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及国家财政农村救济费支出。张秋惠和刘金星(2010)基于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正处于升级变动之中,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而非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却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祁毓(2010)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对于农民而言,虽然家庭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但与家庭经营收入相比,工资收入增加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更大;转移性收入增加能够显著地影响农民消费,财产性收入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却并不显著。温涛等(2013)基于2004—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各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各项收入对各项消费的作用强度

存在明显差异,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其分项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在有关经济问题的研究中,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往往是两个广受重视的解释变量,财政金融支出无疑成为探讨消费问题的核心制度因素。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将通过乘数效应带动产出的成倍增长,再通过消费函数拉动居民消费。新凯恩斯主义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进一步再现了这一结论,于是基于此的研究大多得出政府支出会挤入私人消费的结论(Karras,1994;Blanchard et al,2002;刘溶沧等,2001;胡书东,2002)。但Bailey(1971)首先认为在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也就是挤出效应。Barro(1985)通过建立一个关于政府在消费和服务上的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拓展了Bailey的研究,认为虽然政府的公共支出在短期和长期都具有正的消费与产出效应,但政府支出短期内增加引起消费增加的幅度小于政府支出增加的幅度,而政府支出长期增加的产出与消费效应比政府短期支出增加的产出与消费效应更低,这进一步显示了长期中政府支出对消费与产出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得出类似结论的还有Aschauer(1985)和Ahmed(2000)等。具体到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也主要存在以下分歧:一种认为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是挤出的(Kormendi,1983;Andrew et al,2008;殷善福等,2011;李伶俐等,2012),另一种则认为是挤入的(Devereux et al,1996;Barnett et al,2010;胡永刚等,2009;李晓嘉,2010)。另外,尽管以往的研究证明农业信贷补贴政策在不少情况下无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但是,Jappelli等(1998)研究发现,越是信贷受约束的个人越是有较大的消费敏感性。刘广明(2011)指出,金融支持是农村消费市场开拓的关键环节所在,金融将通过投资和消费信贷两种注入方式推动农村消费。李伶俐和王小华(2012)运用我国1952—2009年的数据研究表明,农村信贷的增加对农村消费有强劲的促进作用。

从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者已经对农民收入与农民消费、财政金融支农投入与农民消费的关系做出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对农民收入不同构成、财政金融支农投入与农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焦点。但相关文献却更多的只是从整体层面所进行的分析,少有研究考虑到不同时

空内农民收入构成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的显著差异对消费产生的不同影响,因此制约农村居民消费扩张的因素还有待于进一步揭示。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农民收入结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与农民消费之间的时空差异进行深入探索。

## 二、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1. 实证模型推导与构建

根据Hayashi(1982)的研究思路,我们首先可以得到一个农村经济的总消费函数:

$$C_t^* = \alpha W_t + \mu_t \quad (1)$$

式(1)中, $C_t^*$ 表示农村经济中的有效消费总量, $W_t$ 表示由农村经济中当期及未来折现的收入流所决定的社会财富总量, $\alpha$ 表示财富的消费倾向, $\mu$ 为短期消费的随机波动。本文根据苑德宇等(2010)的做法假设农村居民在 $t$ 期经济中的总消费包括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来自农村居民私人的消费( $C_t$ ),二是政府财政支农支出( $g_t$ )对私人消费的作用,即:

$$C_t^* = C_t + \beta g_t \quad (2)$$

(2)式中,如果 $\beta > 0$ ,则说明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促进(挤入)的作用,反之则反。

对于式(1),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收入是农村居民财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根本性因素。然而,在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等诸多因素影响之下,不同性质的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假设中国农民既是消费者,又是直接的生产经营者和投资者,其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是密不可分的。由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复杂,支出去向多样化,本文假设农村经济中存在借贷的情况,我们可以把农村居民(消费者)的财富总量写成其各项收入现金流量的现值总和,即:

$$W_t = \gamma Y_t + \varphi(\theta G_t - T_t) + \varphi(\delta L_t - PL_t - T'_t) \quad (3)$$

其中, $Y_t$ 为真实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现期值, $G_t$ 和 $T_t$ 分别表示当期及未来的财政支农支出( $g_t$ )和税收( $t_t$ )的折现值, $\theta G_t$ 代表由当期和未来的财政支农支出给农村居民(消费者)所带来的财富效应, $L_t$ 、 $PL_t$ 和 $T'_t$ 分别表示当期及未来的农村贷款( $l_t$ )、还款( $pl_t$ )和经营税收( $t'_t$ )的折现值, $\delta L_t$ 代

表由当期和未来的农村贷款给农村居民(消费者)所带来的财富效应。

如果农村居民、政府、金融机构在跨期内实现预算平衡,也即是 $G_t = T_t$ 和 $L_t = PL_t + T'_t$ ,代入式(3)便有:

$$W_t = \gamma Y_t + \varphi(\theta - 1)G_t + \varphi(\delta - 1)L_t \quad (4)$$

由此可以看出, $(\theta - 1)G_t$ 出现在财富的表达式中,只要 $\theta \neq 1$ ,财政支农支出资金的变动就会给农村居民的消费带来正或者负的财富效应(Aschauer, 1985);同样,只要 $\delta \neq 1$ ,农村贷款的变动也会给农村居民的消费带来正或负的财富效应。合并式(1)、(2)和(4),有:

$$C_t + \beta g_t = \alpha[\gamma Y_t + \varphi(\theta - 1)G_t + \varphi(\delta - 1)L_t] + \mu_t \quad (5)$$

考虑到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作用,我们把 $g_t$ 移项后并入到 $G_t$ 中,然后用 $\beta_1$ 、 $\beta_2$ 和 $\beta_3$ 分别表示项 $Y_t$ 、 $G_t$ 和 $L_t$ 前的系数,式(5)可简化为:

$$C_t = \beta_1 Y_t + \beta_2 G_t + \beta_3 L_t + \mu_t \quad (6)$$

因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其性质可分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所以式(6)可进一步转化为:

$$C_t = \beta_1 G_t + \beta_2 L_t + \beta_3 Y_{1t} + \beta_4 Y_{2t} + \beta_5 Y_{3t} + \beta_6 Y_{4t} + \mu_t \quad (7)$$

上式说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受到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水平( $G$ )、金融机构农业信贷投入水平( $L$ )以及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 $Y_1$ )、经营性收入水平( $Y_2$ )、财产性收入水平( $Y_3$ )和转移性收入水平( $Y_4$ )的综合影响。

### 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被解释变量: $consumption_{it}$ 表示第 $i$ 个地区第 $t$ 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2)。

解释变量:(1)农民收入结构, $wage_{it}$ 、 $business_{it}$ 、 $property_{it}$ 和 $transfer_{it}$ 分别表示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2)。(2)外部输血性引导, $fiscal_{it}$ 和 $loan_{it}$ 分别表示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指标,用以反映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农民消费的推动作用。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可通过信贷和财政支持实现为“三农”“输血”,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

资金供求的矛盾,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提升农民消费水平的目标。因此,本研究采用人均财政支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人口之比)和人均农业信贷量(农业信贷年末余额总额除以农村人口)来衡量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进而分析外部输血性引导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以及 2010—2012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文中变量均以人均数而非总水平值表示,是为了更好地排除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影响;同时考虑到面板数据固有特性,为消除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多重共线性等问题,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处理。表 1 为实证研究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元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 Obs	平均值 Mean	标准差 Std. Dev.	方差 Variance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偏度 Skewness	峰度 Kurtosis
农民消费	<i>consumption</i>	450	2 806.614	1 764.641	3 113 958	506.64	11 077.66	1.834 913	7.325 432
工资性收入	<i>wage</i>	450	1 537.25	1 614.039	2 605 121	52.65	10 493.03	2.420 052	10.108 88
家庭经营性收入	<i>business</i>	450	1 922.963	780.137 5	608 614.6	589.74	4 981.76	1.140 804	4.264 866
财产性收入	<i>property</i>	450	121.802 5	186.377	34 736.37	2.77	1 537.01	4.065 69	23.587 32
转移性收入	<i>transfer</i>	450	244.822 5	329.023 6	108 256.5	20.27	3 439.94	5.047 524	38.262 82
财政支农	<i>fiscal</i>	450	595.387	951.621 9	905 584.2	14.76	6 725.14	3.502 16	17.898 64
农业信贷	<i>loan</i>	450	3 365.338	7 144.305	5.10E+07	67.06	71 767.61	5.701 735	44.129 33

注:本表所有数据均由 STATA12.0 计算而来。

###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做面板数据分析时,首先应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最优测度。为此,进行面板模型的 F 检验,如果 F 值大于临界值则摒弃混合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 Hausman 检验,如果 Hausman 值大于临界值,则说明应该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否则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本文使用 STATA12.0 软件对 1997—2011 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包括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投入)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另外,为了验证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段的差异,本文第一个模型采用了全样本进行回归,然后的 9 个模型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也就是每 7 年为一个时间段,后一阶段为前一阶段剔除最前面的一年之后再增加一年),各个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不难看出,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模型 I—X 均采用固定效应影响形式。从面板模型的拟合优度看,每个回归模型的  $R^2$  均大于 0.625,完全满足面板数据的估计精度要求;所有模型的 F 值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能通过检验,表明模型中各解释变量与被

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拟合优度很好。另外,所有模型中的同一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各项回归系数保持符号完全一致,只是其显著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说明农民的各项收入以及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长期关系比较稳定。除此之外,模型 II—X 的拟合优度呈逐渐扩大的趋势,足见各解释变量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在不断增强。

由表 2 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 1997—2011 年,农村居民的各项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和和农业信贷投入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均表现为显著的挤入作用,且收入结构的回归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一直以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只是近年来有所下降,但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之比仍在 45% 以上),因此对消费的贡献作用也最大,与预期相符。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组成部分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仅次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并且近年来两者占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靠近,但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却远远小于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虽远远小于家庭经营和工资性

收入,但对消费的贡献却明显大于工资性收入(0.12>0.09),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民的消费支出存在明显的“心理账户”<sup>①</sup>现象,通常当收入位于某一水平之下的情况下,人们会把辛苦挣来的钱存起来不舍得花,但是如果有一笔“意外之财”,则可能很快就花掉。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其转移性收入具有暂时性、非传统收入的特征,虽然在收入构成中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在农民消费支出过程中却表现出相对宽松的状态,从而对生活消费的拉动效应就较为明显(温涛等,2013)。财产性收入的回归系数最小,可能原因是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过于单

一,且数额太小(1985年至今,财产性收入占比一直低于4%)。这就客观上要求逐渐、稳步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丰富收入来源渠道,使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对于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长,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措施就是确定农民的“三权”<sup>②</sup>,因为能为农民带来收入的财产是具有增值能力、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具有流动性的财产,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条件是要让农民拥有财产并得到法律有效保护,要创新相关金融产品,发展农村金融市场,要让更多的农民具有金融知识和金融意识。

表2 实证分析结果(1997—2011年)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V	模型 V	模型 VI	模型 VII	模型 VIII	模型 IX	模型 X
	1997—2011	1997—2003	1998—2004	1999—2005	2000—2006	2001—2007	2002—2008	2003—2009	2004—2010	2005—2011
<i>wage</i>	0.088 143 9 (0.001)***	0.045 915 (0.165)	0.109 181 7 (0.001)***	0.147 820 5 (0.001)***	0.224 533 5 (0.000)***	0.266 632 2 (0.000)***	0.274 466 (0.000)***	0.278 745 1 (0.000)***	0.218 414 7 (0.001)***	0.184 337 8 (0.007)***
<i>business</i>	0.215 215 3 (0.000)***	0.216 417 3 (0.004)***	0.281 755 8 (0.000)***	0.324 419 (0.000)***	0.330 862 9 (0.000)***	0.381 474 9 (0.000)***	0.382 353 5 (0.000)***	0.206 216 6 (0.008)***	0.178 455 2 (0.011)**	0.163 632 3 (0.025)**
<i>property</i>	0.056 127 5 (0.000)***	0.038 720 7 (0.007)***	0.043 683 3 (0.003)***	.061 901 6 (0.001)***	0.058 528 2 (0.014)**	0.037 829 1 (0.113)	0.052 434 7 (0.042)**	0.061 118 8 (0.024)**	0.068 538 3 (0.006)***	0.070 621 9 (0.002)***
<i>transfer</i>	0.124 668 3 (0.000)***	0.086 669 6 (0.000)***	0.083 637 4 (0.000)***	.0754 739 (0.001)***	0.085 700 5 (0.000)***	0.083 436 6 (0.000)***	0.080 579 4 (0.001)***	0.061 118 8 (0.000)***	0.158 443 4 (0.000)***	0.156 453 2 (0.000)***
<i>fiscal</i>	0.095 594 7 (0.000)***	0.096 826 1 (0.001)***	0.062 710 7 (0.009)***	0.034 830 1 (0.186)	0.004 298 (0.869)	0.008 144 6 (0.718)	0.021 872 2 (0.326)	0.038 285 8 (0.066)*	0.026 059 5 (0.171)	0.022 135 7 (0.249)
<i>loan</i>	0.057 996 8 (0.000)***	0.087 894 4 (0.000)***	0.100 136 8 (0.000)***	0.081 667 8 (0.000)***	0.064 959 9 (0.002)***	0.050 247 8 (0.009)***	0.031 256 9 (0.185)	0.030 584 (0.187)	0.021 074 3 (0.076)*	0.015 215 7 (0.058)*
常数项	3.821 072 (0.000)***	4.086 937 (0.000)***	3.290 265 (0.000)***	2.981 038 (0.000)***	2.685 771 (0.000)***	2.208 4 (0.000)***	2.167 026 (0.000)***	3.206 953 (0.000)***	3.683 639 (0.000)***	3.973 438 (0.000)***
样本量	45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R <sup>2</sup>	0.922 5	0.625 0	0.749 8	0.750 4	0.796 2	0.857 2	0.880 1	0.894 8	0.917 9	0.934 6
F 值	761.39***	48.34***	86.91***	87.18***	113.31***	174.11***	212.83***	246.66***	324.38***	336.42***
Hausman 值	40.27***	30.97***	23.88***	17.30***	12.10*	13.58*	12.06*	10.82*	12.54*	11.04*
模型形式	固定									

注:本表所有数据均由 STATA12.0 计算而来,小括号里面的值代表 P 值,\*、\*\*、\*\*\*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

<sup>①</sup> 心理学中的“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理论认为,人们会根据财富来源的不同将收入与支出划分成不同性质的、收入与支出相互对应的多个心理分账户,每个分账户有单独的预算和支配规则,金钱并不能容易地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Thaler,1985),因此,不同来源的收入具有不同的消费结构和资金支配方向(李爱梅等,2007)。

<sup>②</sup> 农民的财产权包括土地的经营承包权、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经济的收益权,即农民的“三权”。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认为,农民“三权”资产化,是解决农民创业、解决农民资金缺乏,进而解决家庭收入增收的一个重要手段。允许农民把“三权”作为一种资产进行抵押贷款,这样农民在外地打工需要买房定居时,可以使用这笔贷款解决面临的问题。

从外部输血性引导的相关变量来看,虽然总体上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投入均对农村居民消费起到了显著的挤入作用,但近年来,这种挤入作用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弱化趋势(模型II到模型X中财政支农和农业信贷对应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均有所降低)。一方面的原因可能在于财政金融政策对“三农”的支持还存在结构效应,意味着不同类型的支农支出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机理与路径不同,导致影响效果不同。比如有的研究认为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补贴性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朱建军等,2009);尹学群等(2011)的研究表明,农户信贷中的农业生产性信贷水平对农户消费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消费型信贷水平却与农户平均消费水平有负相关关系。当支农支出在各种类型的分配偏重不同时,便会改变其对农村消费挤入作用的强弱程度。另一方面的可能原因是财政金融支农政策长期以来作为一种外部输血性引导的外生机制,不可避免会带有投入随意性比较大、短期频繁波动、应急色彩浓厚等突出问题(温涛等,2012),因此在长期内,对于促进中国农村消费市场的作用极为有限。再加上长期、重复的财政支农容易使各方形成补贴依赖,不利于农民和农业的自身发展,对农村消费困境的摆脱也只能是“杯水车薪”。面对数量庞大的贫农,资金明显不足和相关政策不够完善,最终导致大量财政金融支农资金配置不合理,部分真正急需消费的穷人可能处于财政支农政策的“锚定”之外,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作为一种外生力量对拉动内需的重任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在长期内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必须形成明确的原则、使用方向、操作规则和监督检查制度,否则可能造成资源分配不当和浪费(王小鲁等,2005),同时需要注重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密切配合,才能对扩大农村消费起到互补增效的作用。

####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表示外部输血性引导,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民收入结构(包括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变迁(包括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投入)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农民的各项收入对其消费支出均存在显

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但是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其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相反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其消费的贡献却在逐渐降低。(2)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也对农民消费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在近年来表现出了明显的弱化趋势,且其作用明显小于各项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扩大农村消费不再是简单地提高农民收入总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调整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的配置方向。因此,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在不断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更加重视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优化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引导方向,最终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具体来说:(1)继续推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与结构优化,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务农、务工收入,在保障与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总额的增长的同时,积极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扩张,保证原有重要性收入份额的同时尽量丰富收入来源渠道,使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2)财政支出是政府行使职能的重要体现,金融支持是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所在,两者作为重要的外部输血性引导,其规模的合理化和结构的优化对于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要适应农民的需求,调整财政金融支农结构,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和农村信贷中的生产性信贷投入。另一方面应解决好长期以来财政金融支农投入随意性比较大、短期波动频繁、应急色彩浓厚等突出问题,尽快构建并健全长效机制,确保财政金融支农投入随国家财力增长和金融发展而合理地持续较快增长。

#### 参考文献:

- 蔡跃洲.2009.经济刺激计划与农村消费启动——基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解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7):4-12.
- 胡书东.2002.中国财政支出和民间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6):26-32.
- 胡永刚,杨智峰.2009.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村产出与居民消费影响的SVAR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7):19-32.
- 刘溶沧,马拴友.2001.赤字、国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兼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具有挤出效应[J].经济研

- 究(1):13-28.
- 刘广明. 2011.农村消费市场开拓的金融支持探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6):35-40.
- 李爱梅,凌文轻,方俐洛.2007.中国人心理账户的内隐结构[J].心理学报(4):9-13.
- 李伶俐,王小华. 2012.信贷刺激、财政引导与农村消费脱困[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0-16.
- 李锐,项海容.2004.不同类型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6):9-13.
- 李晓嘉.2010.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效应分析[J].经济学动态(9):31-34.
- 祁毓.2010.不同来源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9):45-56.
- 王小鲁,樊纲. 2005.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10):24-36.
- 温涛,田纪华,王小华.2013.农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结构的总体影响与区域差异研究[J].中国软科学(3):42-52.
- 温涛,王小华.2012.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基于1952—2009年的经验验证[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43-49.
- 殷善福,黎东升.2011.农业财政支出对农民消费效应:挤进或挤出[J].农业技术经济(12):17-33.
- 尹学群,李心丹,陈庭强. 2011.农户信贷对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5):21-27.
- 苑德宇,张静静,韩俊霞.2010.居民消费、财政支出与区域效应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分析[J].统计研究(2):44-52.
- 张秋惠,刘金星.2010.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支出行为的影响——基于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4):48-54.
- 朱建军,常向阳.2009.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模型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38-45.
- AHMED H, MILLER S M. 2000. Crowding-Out and Crowding-In Effects of the Components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ANDREW M, HARALD U. 2008.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shock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14551.
- ASCHAUER D A. 1985. Fiscal Policy and Aggregate Demand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117-127.
- BAILEY M J. 1971.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Price Level [M]. New York: McGraw-Hill.
- BARRO R J. 1985. Output effects of government purchas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343-350.
- BARNETT S, BROOKS R. 2010. China: Does Govern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Spending Boost Consumption [R]. IMF Working Paper, 15(2):10-16.
- BLANCHARD O, PEROTTI R. 2002. An Empir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ynamic Effects of Changes i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es on Output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1329-1368.
- CARROLL C D. 1992. The Buffer-Stock Theory of Saving: Some Macroeconomic Evidence [R].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61-156.
- DEATON A S. 1991. Savings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J]. Econometrica, 59:1121-1148.
- DEVEREUX M B, HEAD A C, LAPHAM B J. 1996.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8:233-254.
- DUESENBERY S.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M]. Cambridge, 1949.
- DYNAN K E. 1993. How Prudent are Consumer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1104-1113.
- FRIEDMAN M. 1957.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UISSO L, JAPPELLI T, TERLIZZESE D. 1992. Earnings Uncertainty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307-337.
- HALL R E. 1978.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J].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6):971-987.
- HAYASHI F. 1982. Th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is: Estimation and Testing by Instrumental Variabl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0:895-916.
- JAPPELLI T, PISCHKE J S, SOULELES N S. 1998. Testing for Liquidity Constraints in Euler Equations with Complementary Data Source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0(2):251-262.
- KARRAS G. 1994.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6(1):9-22.
- KEYNES J M. 1936.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26(3):490-493.
- KORMENDI R C. 1983. Government Debt,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Sector Behavior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994-1001.
- LELAND H S. 1968. Saving and Uncertainty: The 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Saving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2(3):465-473.
- MODIGLIANI F, BRUMBERG R. 1954.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oss Section Data [M]// KURIHARA K K.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THALER R. 1985. Mental Accounting and Consumer Choice [J]. Marketing Science, 4(3): 199-214.
- WILSON B K. 1998. The Aggregate Existence of Precautionary Saving: Time Series Evidence from Expenditure on Nondurable and Durable Goods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 309-323.

## Optimizing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External Transfusion Guidance and Expanding Rural Consumption

WANG Xiao-hu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By taking the policies of financial agriculture-support as external transfusion guidanc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during 1997-20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support policy evolution and farmers' consumption is analyzed, an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f all kinds of farmers' income on their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e., their coefficients rank from big to small is in turn family business income, transferred income, wage income and assets incom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impact of farmers' wage income and transferred income on their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on the contrary, the contribution of farmers' family business income to their consumption is gradually decreasing, that financial support to agriculture and the loans of financial agencies to agriculture also play significantly boosting role in farmers' consumption. Thus, China should optimize the distribution direction of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agriculture-support input, actively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farmers' assets income and transferred income, and enlarge the input expenditure in financial agriculture-support and production credit input in rural credit.

**Key words:**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rural consumption; family business income; transferred income; wage income; assets income; financial agriculture-support expenditure; agricultural credit input; financial agriculture-support policy

**CLC number:** F014.5; F323.8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14)02-0034-09

(编辑:夏冬)